

留日及东游归国群体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

江 沛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摘要：本文研究的主题，在于探讨1900-1928年间留日学生群体、赴日考察官绅及其他人士在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对留日学生所学专业及赴日考察官绅所关心领域的分析中，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探讨这一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在这一时期引入日本经验、推动直隶省近代化进程中，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民国初年直隶省府也延续了这一作法，使以天津、北京为龙头的直隶省近代化走在了全国前列。在这一过程中，直隶省采取有效措施，既注重派出留学生系统吸取近代化知识体系，也注重通过派出考察力促各级官员的观念转变，两相结合，有效排除了因制度与观念间差异进而导致近代化进程受阻的障碍。笔者以为，直隶省的这一作法，是后发国家区域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之一，藉此，本文力求阐释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及技术交流的关键性意义。

关键词：留日学生；东游官绅；直隶省；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甲午战后，东邻日本神话般崛起与中国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抱着救国救民的意识，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扶桑考察日本成功的经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及考察人士归国后，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以1900—1928年间直隶省留日归国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留日归国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力求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意义。

本文使用的直隶省概念，系以当时的行政区域为基本范畴。1928年前，北京一直是清代及民国的首都，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直隶，但在地理上，北平与直隶省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本文所述事实包括北京市的有关情况。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由于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人才、企业及金融业大批南移，对于河北省（1928年由直隶省改称）影响极大，加上此后的中原大战及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内无动力、外无和平，河北省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

一、学养分析与职业分布

近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具有几乎同时经历了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遭遇。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却仍在“中体西用”抑或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中踟躇不前。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惨败。昔日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日战败中经受强烈刺激。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①此后，“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极大刺激了中国人，在不少以为日本成功崛起在于立宪制度的青年中，掀起了海外留学热潮，赴日留学更是首当其冲。”^②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希望。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1册，北京：神州国光社1955年版，第249页。

^② 《外国における支那留学生調査関係雑件》（大正七年四月），H.7.1.0-10，日本外交史料館存。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这样的学生过去一般是安排日人进入公使馆教习。此次，公使裕庚通过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经意间，近代中国留日及考察日本的历史大幕，被13名事实上的留学生拉开了。

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要“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上述基本理念却指导着急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直接影响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扶桑留学和对专业的选择。

1898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此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蔚为壮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进行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留日学生一般都占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明显多于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①与此同时，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

表1：1901—1937年间留日中国学生数量统计表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274	608	1300	2406	7285	7283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6797	5217	5266	3979	3328	1437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	3796	3111	2790	2891	3724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3455	3251	2119	2246	约1000	----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总计	
2095	1354	1924	2480	79520	

资料来源：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85—186页。[日]二见刚夫、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94期（1978年3月版）。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7页。[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8月版，第444—449页。刘志强：《北洋政府时期的留学教育》，留学生丛书编委会：《中国留学史萃》，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5月版，第73页。关于1906—1921年间留日学生数说法不一，可参见：《1906年至1921年留学日本学生人数统计表》，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680页。《外国における支那留学生調査关系関係雑件》，H.7.1.0-1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館存。

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资格限制不严，不需办理护照及留学证书，加上国土相近，同文同种，且生活及学习费用低廉，“日本完备的教育体系及专为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制度”，^②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东渡求学。由于来源杂多，公费生与自费生兼具，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梁启超曾言：“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斧资，茹根尝胆而来者。”^③相比于赴欧美留学生，留日学生的学业素养相对较差。据1935年统计，赴日中国留学生中，本科毕业生仅占11.8%，专科

^① 1921年至1926年间，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仅为1189人。同期各省确定的省费学生定额中，留学日本的定额为1075人，也大大高于留学欧美的318人定额。参见：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95-596页。

^② 《外国における支那留学生調査关系関係雑件》（大正七年四月），H.7.1.0-10，日本外交史料館存。

^③ 《行人失辞》，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732页。

毕业生占 12.7%，其余 75.5% 的人为大专学校的肄业生或中学毕业生。^①因而，留日学生的声誉及整体质量较留学欧美学生为差，当时人们曾戏言：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是“镀银”。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使知识分子常常处于一种超快振兴的焦虑中，激进主义思潮、“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此起彼伏，影响了几代青年学子，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专业的选择。如 1909 年，无论是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 5 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进入其他 135 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均是以医科、药学科、法科、工科为主，^②选择进入基础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学习者较少。这一情况在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故。^③在 1917 年 1084 名留日学生中，除 267 人进入预科学习外，选择工科者 279 人、医科者 156 人、师范者 64 人、商科者 53 人、农科者 50 人，选择学习法科者略有减少，为 18 人。^④而据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调查，1931 年留日学生的专业分布在继续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学习军事、交通者大大增加，显然是受到中日间日益紧张的战争气氛的影响。^⑤

从籍贯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极不平衡，呈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偏远省份递减的特点。整体而论，出身长江以南诸省的留日学生数量普遍多于华北诸省，原因很多。虽然留学归来后他们不一定就回到原籍活动与工作，但这一比例还是对后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资料，笔者无法系统廓清华北诸省留日学生的数量。从清末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时期华北诸省的官自费毕业生数量占当年毕业留学生总数的 10.19%，排在中游。直隶省留日学生占 5.61%，明显比山东、山西两省为多。^⑥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01—1937 年间，先后共有约 111846 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约 11703 名留日学生从所在各类学校毕业^⑦。他们不仅在日本学习了大量的近代化知识与信息，也对日本文化的特质有了深刻理解，产生了一定的日本情结。除了部分留学生滞留日本或赴欧美继续求学外，大部份留日学生都回到了国内，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

由于地缘关系和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缘故，相当多的华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散布在家乡的各个城市，不少原籍江南的留日学生，也到北平、直隶省的天津、保定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谋求职业，也有不少人深入小城镇和农村从事基础性工作。如 1914 年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有 114 人，1926 年有 54 人。^⑧1928 年前，在北京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约有 1000 人。^⑨回原籍大城市的多，去家乡、外地的少；从事文化、教育、实业的人多，从事政治的人少，这是留日归国群体职业选择上的一个特点。较有名气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阎锡山、段祺瑞、周作人、李叔同等。由于其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留日学生群体在华北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工程等各个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建议，1898 年，清廷又将鼓励官绅自费赴日本考察，列为国策之一。1901 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清帝，“拟请明谕各省人士，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同时要求规定今后，凡“送御史、升

^① 《关于留学教育问题》，《留东学报》创刊号（1935 年 7 月），转引自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第 25 页。

^②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204-205 页。

^③ 《1914 年至 1915 年留学日本官费生统计表》，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第 1 版，第 693 页。

^④ 《1917 年留学欧、美、日官费生专业统计表》，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第 597 页。

^⑤ 《寰球中国学生会调查留日学生统计》（1931 年 6 月 1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教育分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第 398 页。

^⑥ 《清末各省留日毕业学生统计表》，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213-215 页。

^⑦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 8 月版，第 451 页。

^⑧ [日]二见刚夫、佐藤尚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关系统计》，《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 94 期（1978 年 3 月版）。

^⑨ 《在本邦留学生调查関係雑件》第 4 卷，H. 7. 1. 0-12，日本外交史料館存。

京师、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或三年或一年均可。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师、放道员者”。^①袁世凯也上奏陈说：“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要求“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再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数年之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惟有上下一心，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②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力陈下，1905 年，清帝废除延续达 1300 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时对在外学习成绩优秀者予以不同的官级奖励，在传统的进身之路封闭后，又开启了一扇新的功名之门。此后，赴日考察实业、技术及教育的官绅者日众。

1901 年 11 月，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积极推动直隶省的官绅游学。1902 年，派北洋农务局总办黄璟赴日“购买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③1903 年 4 月，袁世凯又派主持直隶新政的洋务局会办候补道钱荣、北洋农务局总办黄璟、工艺局会办张柢、银元局总办候补道周学熙、官报局总办候补道张孝谦、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等人，率近 60 人的考察团参加在大阪举办的日本劝业博览会。^④为创办新学，袁世凯又在 1903-1904 年间，先后派遣直隶学校司参议丁惟鲁、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等人赴日考察学务。至 1905 年 5 月，经袁世凯之手派出赴日游学的直隶省官绅士人，“官费、自费各学生计一百数十人”。^⑤1905 年 6 月，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第一期游历士绅 40 余人^⑥，历时 5 个月；7 月，第二期游历士绅 72 人；8 月，第三期游历士绅 60 余人，历时 5 个月；9 月，第四期游历士绅 50 余人。据统计，1903-1907 年间，游日官绅的数量达到高潮。^⑦1901-1910 年间，由清廷派遣赴日考察的官绅共计 420 人，同时各地也派遣 916 名官绅赴日考察，其中由袁世凯派出的官绅达到 225 名，高居各地之首。^⑧1916-1918 年间，直隶省又先后派出数批官绅考察日本的教育。直至 1920 年后，考察日本的官绅才渐渐稀少。在这一群体中，较有名气者有周熙、严修、黄璟等人。

表 2：1893-1927 年间直隶省东游官绅一览表

年代	数量	考察及学习内容	考察实态
1893	1	煤矿及纺织所	
1898	3	化学、机械学	全部入东京帝国大学
1899	12	机械、政治、法律、军事	全部入日本高校或军校
1900	1	军事	入日本军校
1901	11	医学、法律、师范、织染	全部入日本高校
1902	84	军事、法律、农业、教育、政治经济学。	55 人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3 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 人自费入学，10 人短期考察。

^① 张之洞、刘坤一：《议复新政第一折》，引自舒新城主编：《近代中国留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50 页。

^② 《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61-1162 页。

^③ 《省城设立农务局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77 页。

^④ 《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视察雜件》（清国部分）第 1 卷，3.9.4.34-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存。

^⑤ 《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61 页。

^⑥ 《外国官民本邦及鲜满视察雜件》（清国部分）第 1 卷，3.9.4.34-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存。

^⑦ 熊達雲：《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考察》，東京：成文堂 1998 年版，第 101 页。

^⑧ 万新平：《清末新政时期华北近代教育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城市史研究》第 21 辑（特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第 286 页。

1903	113	法律、医学、农业、机械制造、博览会、教育、监狱、军事、化学、电机、药学等。	短期考察的各类官员 27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1904	144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商业、行政、机械、化学、经济、教育品陈列所、监狱。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0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1905	约 333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商业、行政、司法、机械、化学、经济、监狱、农业、警察、美术、人文等。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254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1906	56	行政、经济、工农业、学校、银行、警察、监狱、司法、警务、化学、音乐等。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27 名，余皆入各类学校。
1907	99	地方自治、行政、学校、商业、法律、警察、监狱、军事等。	86 人考察地方自治，9 人一般考察，余入各类学校。
1908	6	地方自治、经济等。	3 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09	4	水产、教育等，购置枕木。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0	5	政治、法律、教育等。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4	1	博览会	
1916	10	教育。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7	64	教育、水产等。	53 人为短期教育人员，其中 38 人为各类学校教师。
1918	12	教育、法律等。	10 人为短期考察教育人员。
1919	3	纺织、化学等。	均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资料来源：根据《附录二：清末民初直隶省官民东游者一览表》（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0-251 页）整理而成。

和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集中学习基础知识不同的是，游学官绅多是考察实际政务或学务的，诸如农业、造币、印刷、机器、军事、纺织、学校、行政机关、司法甚至监狱等，无所不及。由于从政人员及在各地举足轻重的绅士的眼界开阔，对于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不少新的技术工艺、新的教育方式均在直隶得以落实，使直隶省成为当时在不少方面屡开风气之先的省份。

二、更新司法与效法自治

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赴北京就任中央政府各部或赴直隶省就职，将自己所学融入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直隶省的游学官绅归国后，由于多担任官职或影响一方，在职权范围内迅速地将其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管理措施，直接应用在直隶省的司法、体制管理上，对于直隶省行政管理体制近代化的发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3 年 9 月，天津府知府凌福彭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洋务委员富士英，对日本各地的监狱管理，从沿革、管理制度、建筑样式、经费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凌福彭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阐述“方今各国环峙，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

不能修”的道理，认为应该效法日本，对犯人进行生活技能的培养，“讲求工艺以辟其生机，修改刑律以宽其手足，明罚敕法，禁民为非。监狱中多一囚徒，则闾里中少一匪类；工场中多一手业，则廛市中少一惰民，似于治理不无裨益。”^①袁世凯批示由凌福彭与南北巡警局协商推动狱制改革。1904年，凌福彭在天津创办罪犯习艺所，直接采用日本成法，制定《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②据此，以日本监狱为模式的罪犯习艺所正式开办，数月后已是“极形整齐，成效显著”。1905年上半年，直隶省在省城保定又创办一处罪犯习艺所。1906年，在天津罪犯习艺所附近再开了一所游民习艺所。留日两年、时任赤城县丞的涂景瑜，在对东京、巢鸭、小管、市谷、横滨及小田原等地监狱的实地考察后上书北洋大臣袁世凯，要求依照日本监狱制度中的完善之处改良直隶监狱管理体制，但他也批评了日本监狱“教养感化”不够，重犯率较高的问题。^③1911年，游民习艺所改名为天津监狱，1913年更名为地方模范监狱，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监狱之一。习艺所大小约有百余间房屋，内设地毯、藤编、纺织、磨面、印刷等各种手工工厂，犯人在此每天工作8小时，原料由工厂负责供给，犯人工资的1%归个人所有，其余归监狱。如有的学者所言：天津游民习艺所就是仿效日本监狱制度中惩治场的作法而设置的。^④

天津的监狱制度改革，引起了正在尝试官制改革，计划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实现司法独立的清政府注意。1906年，清廷决定，引入西方司法制度中的审判制度，先从天津府试办。在凌福彭主持下，1907年，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正式成立举行，并在城乡分设4个乡谘局。由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的留学生及游学官绅，主持两厅及乡谘局的审判及日常事务工作。在刑事审判中，仿照日本设立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检事，特设了预审官，改变了过去由少数承审员操纵的作法。审判厅所用人员，均以考试选拔。几个月后，天津府县新的审判体制带来了“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的效果。^⑤从本质上讲，此时天津府县审判制度的改革，还缺少重要的辩护环节，但毕竟是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此后，1912年，清政府的大理院也开始以直隶的司法审判改革为蓝本进行改革。民国成立后，中央司法制度即以直隶司法为模式，建立了中央级的高等审判厅及各地审判厅。在这一过程中，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制经济科、曾任清政府大理院理事、时任北京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江庸（1878—1960），从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明治维新后，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在全国各地试办地方自治，诸如民间教育、消防、水利、卫生等方面，取得了极好效果。1906年8月，天津自治局创立。凌福彭为督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协同办理。留日出身的凌福彭，自然选择了日本民间自治为模式，他广征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乡绅为宣传员，编写白话宣传资料到处散发。同时，由于东游士绅“相继回国，风气渐见开通，惟人数不多，必须原续派遣”，天津自治局也“通飭各州县一律限期选派”。^⑥1907—1908年间，直隶省先后派出百余人赴日考察地方自治的进展，参观日本的参事会、市、区役所、町村役场及议会，对公立学校、警视厅、消防署、水利、卫生、农工等组合、劝业储蓄等银行，酿造所等地，均进行了细致的考察。^⑦回国后，这些乡绅将自己的心得再讲给天津自治局由各地方组织来学习的士绅。经过各方努力，1907年3月，天津自治局起草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获得了仿照日

^① 《天津府凌守福彭考查日本监狱情形节略（督宪札附）》，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5卷吏治，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91页。

^② 《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上海：《东方杂志》第1卷第2号（1904年），第69-72页。

^③ 《留学日本警监学校赤城县丞涂景瑜上列宪改良直隶监狱条陈》，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续编》第4卷吏治，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73-274页。

^④ 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⑤ 《奏报天津地方试办审判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2页。

^⑥ 《天津府自治局覆卢学台为选派绅士游历日本考查自治办法移文》，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1卷自治，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⑦ 《天津府自治局覆卢学台为选派绅士游历日本考查自治办法移文》，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1卷自治，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页。

本设立的天津县自治期成会的批准。该《章程》规定设立天津地方议事会和董事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经过对参选人资格的审查后，6月16日，天津县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治选举举行。共收回有效选票12461张，确定有选举资格者2572人，初选出135人，再从中选出30人当选为议事会议员。7月，以李士铭为议长、王劭廉为副议长的议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既有天津为之模范，其余推行各属，当有事半功倍之望。”^①1910年10月至1911年8月，天津县又成立了8个议事会（董事会、参事会）。至1911年，天津县各自治机构基本建齐。

1908年，以天津自治局为基础，成立了直隶自治总局，负责直隶全省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隶自治研究所成立；10月，直隶宪政研究会成立。由此，始于天津的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向直隶全省各县扩展。在各地的自治运动中，东游官绅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广宗县的自治运动，就是在多次赴日考察自治事务的张鹤鸣及其同事的推动下展开的。静海县的自治活动，也是在游学日本的乡绅的宣讲下展开的。^②1909年，南皮县派尹仲权等6人访日。4个月后归国，他们即召集成立自治预备会，开办了自治研究所，赴日考察的乡绅高登瀛担任讲解工作，培训了一批自治人员。1911年4月，南皮县顺利地建立起议事会和参事会。^③

这一时期的直隶省自治运动，显然多是依照天津模式展开的。天津模式自章程、机构至程序，均源于日本。此时直隶省各地东游考察过的乡绅大有人在，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是天津模式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自治运动，大大弥补了中央政府在地方事务处理上的不足，有效地解决了民间生活、生产上的诸多问题，其中孕育着的政治民主、民权自决等意识，更使直隶引起了当时全国的注目。

三、技术引进与实业弘大

近代以来，中西国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使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表层认识，逐渐进入到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西方经济制度与实业体系的具体学习。清末新政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更是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不言而喻的救国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39年间，留日学生以科技、商业为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工业18校979人，商业9校342人，医学23校414人，农业11校333人，^④这支生力军中相当一批人留在了直隶各地；而东游官绅，也多是在日本考察先进技术的引入和兴办实业的方法，在新技术、新行业的引入上，他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直隶省的近代技术运用及实业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1884—1945），1906年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1908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学科。1912年留日归来后，先在北京政府农商部工作，不久即投身于实业建设。为改革盐政、改良盐质，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后，即着手成立研究室，进行海盐综合利用的研究。当时，各国对于制碱工艺封锁极严，既买不到资料，又得不到设备，但“为解决国人剩盐缺碱之苦”^⑤，范旭东又于1917年设立永利碱厂，产品占有整个华北市场和全国市场的90%，其工艺独创一体，颇有创新。1922年，范旭东又与青岛、济南的实业家合办永裕盐业公司，经营出口盐业。1934年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自任总经理。该公司采用苏尔维制碱工艺，日产量达250吨，产品行销日本、东南亚及国内市场。

^① 《奏报天津试办地方自治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页。

^② 白凤文编、高毓澎纂：《静海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269页。

^③ 王德乾等修、刘树鑫等纂：《南皮县志》（民国三十一年铅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17-518页。

^④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下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734页。

^⑤ 李祉川、陈歆文：《祖国需要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诞生一百周年》，《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范旭东手下聚集了一批曾留日的人才，最为有名的是李烛尘（1882—1968），这位 1918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高材生，回国后即受聘为久大精盐公司的技师。1920 年进入永利碱厂，先后任经管部长、厂长。他利用工厂副产品生产牙粉、牙膏、漱口水等，大大增加了工厂的产品销路。此外，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还有两位关键人物，即享有“东圣”雅称的留日生出身的傅冰芝厂长和有“西圣”美誉的留日、留美生出身的孙颖川。在他们看来，创办实业不仅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因为“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全由于不学。这个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支配了中国命运。……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就产不出新的生命。”^①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吴鼎昌（1884—1950），1903 年留学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1910 年归国。民国成立后，吴鼎昌参加共和党，拥袁世凯复辟。1916 年，吴鼎昌任中国银行总裁兼国务院参议、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等职。1922 年起，先后任四行联合准备库、联合营业事务所及四行储蓄会主任等职，成为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在此期间，他力倡以日本经济体制对民国财政、经济体制进行改造。1926 年 9 月，吴鼎昌买下因亲日而被迫停刊的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使《大公报》在舆论界得以重新立足。

曾留学日本的张品题，归国后出任北洋师范学校理化教习，天津直隶水产学校校长等职。后来，集资创办中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大新织染公司），独资开办了元兴织布厂、元兴面粉厂。1918 年，张品题在天津首创北洋同业公会，并被成为天津染织同业公会董事长。1926 年，出任天津总商会会长。

章鸿钊，1908 年入日本京都高等学校学习，毕业后进东京帝国大学深造。1911 年回国后，任北京政府农林部技正、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特约研究员等职。为华北地区的地质研究作出了贡献。

杨步伟（1888—1981），这位 1919 年从日本长崎女子医学校毕业归来的女博士，在北京创办森仁医院，1925 年曾在北京设立生产限制诊所，提倡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其观念在当时的直隶社会可谓是空谷足音。

曾以创办金城银行闻名的周作民（1884—1955），江苏淮安人，1906 年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经济科毕业后归国。1912 年起，任北京政府国务院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并代理国库的交通银行总行担任稽查课主任。1917 年 5 月，周作民利用自己在经济界的条件，在天津创办了后来有“北四行”之称的金城银行。该行以日本式的管理模式进行运作，“资本积累逐步增加，业务发展也迅速，存款一度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它在华北一带，曾和中国、交通、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②。

此外，1911 年从东京药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国的赵鹄黄（1883—1960），长期在北京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了《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新本草图志》（第 1、2 集）、《忻州药志》、《华北药材实地之考察》等著作，确定了其中国现代生药学奠基人的地位。

东游的官绅是，最有影响力的要算是直隶名绅周学熙了。1903 年 4 月，受袁世凯之命，周学熙与他人一同考察日本东、西京较大的学校及工厂。他认为：“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业乎！”^③并决心将“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施诸我国”。^④

1903 年 8 月，在得到袁世凯批准后，周学熙出任设在天津的直隶工艺总局总办。他“酌采日本成法”，制定出工艺局及考工厂的管理方法及章程，^⑤以此机构为核心，推动直隶实业的进展。为打

^①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宣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 2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 页。

^② 许家骏：《我所知道的金城银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88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0 页。

^③ 周学熙：《东游日记》，傅增湘序。

^④ 周小鹏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 页。

^⑤ 《直隶工艺总局详重整局规章程文并批》，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 16 卷工艺，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246-1253 页。

破工商业者保守心态，开阔其视野，1904年，周学熙仿效日本建立考工厂（后更名为劝工陈列所，1913年更名为直隶陈列所），收集国内外名品，宗旨在于“考察本国外国商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①周学熙还派劝工委员到直隶各府县，宣传开办工厂、兴办实业的好处。1906年11月22日，考工厂举办第一次劝工展览会，商品既多且精，参观者达15万人次，交易额突破3万元，成为一时佳话。

1904年，周学熙创办了实习工场，内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等科，成为高等工业学堂学生的实习场所，也同时培训各地前来学习技术的人员。至1907年7月，实习工场共召入官费工徒600余人，自费者200余人。这些学徒毕业后均成为各地开办实业的技术能手。^②天津造胰厂、丹凤火柴公司的创办者，就是从实习工场出来的。高阳县李氏派人至此学习机织技术，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高阳逐渐形成了直隶土布业的龙头。^③到1909年，高阳一带拥有织机数千架，日织土布数千匹。其仿照洋布所织出的斜纹、色标、条布等各色土布，曾得到直隶工艺总局的优奖。^④

1905年，周学熙主持开办官立造纸厂。初设于迁安县，后迁至天津。周学熙派人赴日考察日本造纸厂的原料及技术，后采用宣城造纸法，安置游民100余人，在当时规模是不小的。1906年4月，周学熙创办北洋劝业铁工厂，旨在开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建厂之初，也是派人赴日本大阪铁工厂实习，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后来，该厂制造出织布机、起重机、车床、电风扇、石印机等，并将织布机、轧棉子机推到直隶各县农村。

在工艺总局号召下，到1907年，直隶全省已有工艺局（或称工艺学堂、工艺所、工艺厂）65处，使近代实业在直隶各县扎下了根。周学熙还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二小学堂及艺徒学堂、织布工厂、木工工厂等实业。在曾赴日考察的北洋农务局总办黄璟努力下，北洋烟草公司于1904年2月正式投产。

1909年冬，直隶劝工陈列所举办的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口展览会，在近1个月时间内，参观者竟达40万余人。次年3月16日，该会再次举办，又极获成功。1913年，曾毕业于日本高等工业学校的王竹铭、严智怡出任陈列所所长，陈列所组织人力在全省范围内收集商品，大大丰富了陈列。1913年秋，直隶商品陈列所派人赴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考察商品陈列所的发展状况。为参加1914年4月在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陈列所专门成立赛会事务局，从全省征集了数百件商品参展，博览会结束时，陈列美观有序的直隶商品陈列所和天津造胰公司还得到了大会的表彰。直隶商品陈列所的发展，引起了日本有关人士的兴趣。1915年，日本农商务省书记及商品陈列馆长一行6人，1916年日本大阪住友总店总理铃木马左也等，均曾来所参观。在直隶商品陈列所带动下，望都、南皮、广宗、威县、广平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劝业所。但各县劝业所限于经济资金等问题，创办实业较少，多创办了农事试验场，致力于棉种改良、植树造林、创办苗圃，对于推动农林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实业活动，不仅日本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迅速引入直隶，在制造技术较先进的天津，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产品，也带动了直隶兴办实业的风气，有力地促进了直隶近代化的进程。

四、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大到一个国家、小至局部区域的近代化趋势，不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弘扬实业，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适用人才。因此，这一时期的近代化进程中，为培养出合格的适用人才，直隶省尝试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全新的变革。

^① 《天津考工厂试办章程》，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17卷工艺，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79页。

^② 周小鹏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③ 周小鹏编：《周学熙传记汇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页。

^④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2》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27页。

直隶省的新式教育兴起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仿效日本明治时代实行中小学八年义务制教育后,直隶省各县城陆续兴起了新式学堂。进入 20 世纪后,直隶省的教育有了较大变化。无论大中小学的教育模式,学制、班级设定、教材几乎全部照搬日本,形成了一个极为明显的日式风格,成为了日式教育体系的实验场。

1902 年 5 月,在袁世凯主持下,直隶省率先在保定设立了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编译 3 个处,统管全省教育,聘请日本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学校司顾问。^①1902 年 8 月,在贵州学政职位上回籍的严修,首次赴日考察教育,先后在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了大学、中学、小学和幼稚园,对他触动极大。1903 年 6 月,学校司督办胡景桂率丁惟鲁、学校司随办高淑琦及补用同知晏宗慈赴日,对各类学校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从保定及天津选送了 23 人赴东京宏文学院学习 9 个月。1903 年 10 月,候补道杨沅被派赴日本,考察日本各种公私立学校 5 个月,对日本“进化之速、全球所称羨”的小学教育的制度,做了详细的记载,并请求在直隶全省推广。^②1904 年 5 月,新任学校司严修又再赴日本考察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考察,使直隶教育打上了浓重的日本印记。

1902 年底,世代盐商出身的严修在天津开办女塾,提倡妇女解放。1903 年 2 月,严修又先后创办了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协办了三处官办小学。此外,严修还促成了天津工艺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的创立。补习所开设文、理、法、商等科,聘请张伯苓及留日归国人员金邦平等人授课。严修这些办学活动,均严格按照日本模式进行建设。1904 年 10 月,严修创办敬业学堂,分中学班和高级师范班,即今南开学校的前身。同年,严修还创办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将普通学社改设为师范讲习所,邀请日本归来的陈宝泉、刘潜、刘宝慈等人任教。1905 年,严修开办保姆讲习所,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所教体操、弹琴、游戏、手工、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由日本教师大野铃子讲授。至 1908 年,讲习所共培养出 20 余名幼儿教师,成为天津最早的专业幼儿教育者。1908 年,严修还创办了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初级工艺学堂、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在保定创设了保定师范学校、客籍学堂(专为外省官吏子弟服务)。

担任学校司督办的严修,于 1905 年 8 月令各县皆设劝学所,作为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并制定了《直隶学务处各属劝学所章程》,从所规定事项上可以看出,各劝学所基本采用了日本地方教育及行政管理的办法。各厅、州、县劝学所设主管学董一人,上任前均要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即按照在日本所学进行管理。直隶教育由此颇有起色,声著全国。袁世凯极为满意地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予供指挥而已。”^③

1905 年 3 月,直隶省留学归国者梁志宸等 250 人,上书袁世凯要求“通飭公派绅士游学游历”,称“风气之开,关于学校,学校之兴,关于缙绅,缙绅者能开化,也能阻化者也”。^④5 月,直隶省即出台《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要求各州县均派人渡日考察。掌握实际事务的知州和知县的出游,对于直隶全省的转变观念、在具体运作中纳入新事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严修和直隶提学使卢木斋的推动下,1909 年,全省建立了 152 个劝学所,劝学总董 153 人,劝学员 713 名,均居全国之首,直隶出现了兴学重教的风气。1906-1909 年间,直隶省的 69 个府州县先后成立了教育会,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中,有近 30 人毕业于日本或曾赴日本考察过。^⑤1907 年,回到直隶的留学归国人员,仅毕业

^① [日]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东京:福村出版 1993 年版,第 136-137 页。

^② 《候补道杨沅禀考查日本学务略陈大概情形由并清折》,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 11 卷学务,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51 页。

^③ 宋蕴璞辑:《天津志略》(民国二十年铅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03 页。

^④ 《直隶留学日本学生梁志宸等二百五十人请通飭公派绅士游学游历公禀并批》(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第 11 卷学务,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852 页。

^⑤ 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95 页。

于日本速成师范者就有 200 余名，^①不少地方的学校校长、董事及管理者、教师，也多由留日归国人员担任。1904 年，从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回直隶的陈文甫，应直隶省视学之命，周游百十个县进行劝学，每到一处，就在城镇各学堂视察，在集市进行演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活跃于直隶省各界的这些短期考察人员及留学归国人员，总数在数千人之多。^②

此外，在直隶省教育改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留日归国人员还有：

范源濂（1874—1927），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攻读。1904 年回国，1905 年任法部学堂主事，1906 年创办殖边学堂并筹办优级师范学堂及清华学校。1910 年，任清政府学部参事。1912 年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1920 年，从日本留学生总监督任上下来后的江庸，出任法律编查馆总裁。1924 年在北京开始进入律师业工作，创办颇有影响的《法律评论》杂志。不久出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7 年，在北京参与创立朝阳大学并出任校长。

梁希（1883—1958）为中国林业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于 1916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林科毕业后归国，曾在中日合办的安东（辽宁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同年应聘在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林科任教，在该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林业科学专业。1927 年，梁希被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

汤惠荪（1900—1966），1917 年冬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农业经济学，1921 年毕业回国。抗战前在北京从事农业科研与教学工作。

萧友梅（1884—1940）曾留学日本学习教育与钢琴，归国后，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等处任教。他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写作了大量著作、创作了 100 多首歌曲与乐曲，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有现代中国特点的音乐体系。

陈宝泉（1874—1937），1904 年由日本弘文学院归国，参与周学熙设立天津教育博物馆的工作。后随严修入学务处，参与编纂《直隶教育杂志》，著有《格致教科书》、《国民必读》等书。1905 年随严修入清廷学部，曾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刘宝慈（1873—1941），日本归国后初任保定北关师范学堂教师。1905 年借鉴日本小学经验、开设天津模范小学，苦心经营模范小学达 36 年之久。

此外，1905 年 6 月在天津创办天河师范学堂的胡家祺；1908 年 1 月成立天津音乐传习所的李侨。在北京创办垦殖学校的仇亮（1879—1915）与黄兴等人，创办富训商业学校的文经纬（1874—1913）等，都为直隶的教育发展做出不小的成绩。

1928 年前，在北京的高校中，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中留日归国人员占据优势，如北平大学各个学院院长均是留日出身，有 47 位教授是留日归国者。中国大学 140 名教员中，留日归国者占 36 人。即使在欧美出身者占优势的北京大学，有留日背景的教授也有 13 人。^③

除了天津、北京较为发达的城市外，直隶省各县的教育也有快速进展。1905 年后，直隶省学务公所的 27 名议事员中，有日本留学经历者达 15 人。1908 年开设劝学所的完县，在赴日考察过教育的高登瀛指导下，大力宣传，在各县相继开设学校。到 1934 年，完县共有学校 164 处，就学人数 8000 余人，常年办学经费 59000 余元。^④1905 年后，清河县新设小学 70 余所，到 1912 年有国民学校 84

^① 金淑琴：《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17 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6 页。

^② 金淑琴：《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17 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7 页。

^③ 《在本邦留学生调查関係雑件》第 5 卷，H. 7. 1. 0—12，日本外交史料館存。

^④ 彭作桢等纂修：《完县县志》（民国二十三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76、292 页。

所。^①1904年,广宗县只有小学堂6所。1905年设立劝学所后,学校逐渐增加,至1913年,已有公立高等小学4所、私立小学4所、区立初等小学130余所。^②

与此同时,直隶各地纷纷延聘日本教习,参与直隶省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即是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1年,全国聘用日本人26人,有13人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全国受聘日本人增至218人,直隶即占85人;1908年,全国受聘日本人达到555人,直隶占有174人,居全国之首。在天津的直隶学务公所、直隶工艺局、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保定的直隶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定县的定武中学堂,赵县的赵州学堂,河头的正心义学,唐山的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等处,均有日本教习在执政和参与教育建设。^③

20世纪前期,在直隶省有关政策的引导下,教育界聚集着大批归国留日归国人员,一些东游官绅也无私捐赠,开启了直隶近代教育的先声,他们或在上层进行教育体制的革新,或在下层从事默默无闻的育人工作,为直隶教育近代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1909年,直隶全省共有学堂及教育处所11201所,位居全国第一。^④可以说,教育界是近代以来直隶省近代化较快的领域之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前期,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影响至深。

中国的文化传统及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向来是自上而下式的,在这一过程中,开明执政者的观念变革及政策选择是关键所在。20世纪前期直隶省的大幅改革,特别是各级官员的相继东游,显然得益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极力推动和《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等条文的硬性规定。这一决策的特征,显然意识到了传统基层行政体制中各级主要官员观念变更与否,在新事务的引入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仅靠留学归国人员的观念推动,而无熟稔实务操作的官员配合,社会的变革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如袁世凯所言:“开智道,年少英俊者使之游学,年长更事者使之游历。二者分途并进,多历年所,收效必宏。”^⑤这一时期直隶省社会变革成功,实在是得益于从外至内、从观念、技术到操作各个层面上的配合,这是近代社会变革中值得注意的经验之一。

近代中国人急于摆脱西方列强侵略、主宰国家命运的心态,既产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也产生了以革命建立全新制度、进而达到国家独立的民族激进主义意识。两种观念其实并不矛盾,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大背景下的产物。但关键在于,全新的制度不能凭空而立,需要经济、法治与观念近代化的强力支撑,否则,全新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与交锋中异化。而对社会进步产生真正作用的,则是具体的、先进文化的引入与改良。据估计,1900年至1928年间,在直隶各地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达7000余人,特别是北京、天津、保定等较大城市,更是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的集结地,他们扮演了一个十分出色而又不可缺少的西方文化“二传手”角色,将在日本的所学所见,植入直隶省的司法更新及行政管理、技术引进和实业弘大、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大推进了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

20世纪前期直隶省社会结构近代化的转变过程中,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社会图像。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的新兴产业及职业中,相对而言,在广大农村从事基础性农、林业技术推广及教育者极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留日归国群体需要相应的生活、

^① 张福谦修、赵鼎铭纂:《清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501页。

^② 姜楷修、韩敏修等纂:《广宗县志》(民国二十二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37页。

^③ 金淑琴:《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20页。

^④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338页。

^⑤ 《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图书馆、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页。

文化及技术环境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云集城镇，也使新技术、新产业的推广，教育设施的创办，只能由城市而县乡而农村。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造成了直隶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更应将之视为区域近代化进程中必有的规律性特征。

中日文化的主要交流趋向，从前清时代的东进，一变而为 20 世纪的东西征，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较快地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中国则在“体用”之争中丧失了机遇。近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发展趋势，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差异性，但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同性，后发近代化国家与先进国家间的交流，是一个摆脱落后、迅速融入世界性潮流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区域近代化进程十分有效的手段，而派遣留学生和行政官员的出外考察，更是最直接的学习近代化文明的方式之一。20 世纪前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为我们做出了生动的例证。

Chinese Students, Officials and Gentlemen Returned from Japa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hli Province: 1900-1928

JIANG P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roles played by Chinese students, officials and gentlemen returned from Japan in modernization of Chihli Province from 1900 to 1928. The roles of the returned people as a group in modernization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what the students studied and what the visiting officials and gentlemen interested in to throw light on the three point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echnologic introduc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Yuan Shih-kai the Governor of Chihli Provinces and others gave a critical pus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hli Province by introducing Japanese experi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early tim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hli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ntinued the policy so that the Chihli Province led by Tientsin and Peking stood out nationally in modernization. The Chihli government took efficient policies, not only sending students to learn modern knowledge but also officials to Japan to have their minds changed, clearing away obstacles caused by institutional reforms not in parallel with changing ideas. The model of Chihli is one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regional modernization in a latecomer country. It is argued that cultural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re necessary to modernization of China.

Keywords: Returned Students from Japan; Visiting Officials Returned from Japan; Chihli Province;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 2005-08-30

作者简介: 江沛（1964 - ），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师，博士生导师。